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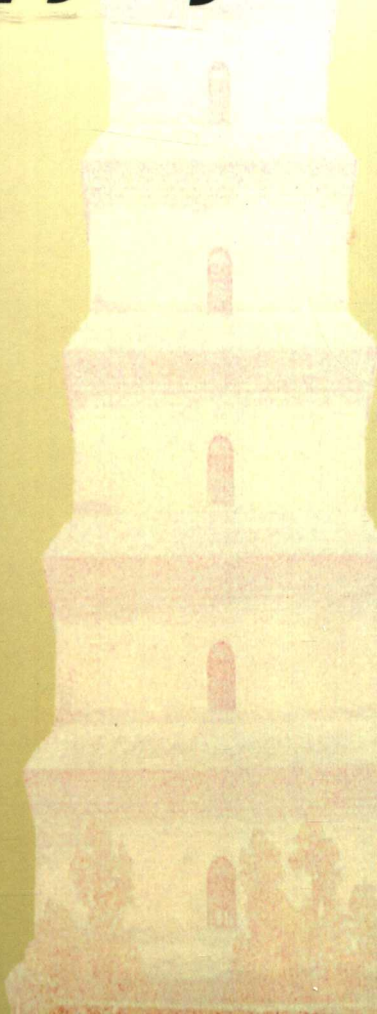
喉舌与

HOUSHEYULIJIAN

王利云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利剑



◎王利云 著

喉舌与利剑

——政治理论研究文集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喉舌与利剑:政治理论研究文集/王利云著. —西安:
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4

ISBN 7-224-06950-7

I. 喉... II. 王... III. 政治理论—文集
IV. D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2750 号

书 名: 喉舌与利剑

作 者: 王利云

出版发行: 陕西人民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: 陕西兰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32 开本 21.25 印张 6 插页

字 数: 521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

书 号: ISBN 7-224-06950-7/D · 1045

定 价: 50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选录作者从教23年来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、政治工作研究、思想教育研究、道德建设研究、教学改革与教学法研究等方面，已发表或交流的文章60余篇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本书可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教师、研究人员、政工干部阅读参考，亦可作为高校文科学生、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”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材料。



王利云，陕西大荔人。1972年入伍，历任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。先后毕业于装甲兵学院、河北大学、南京政治学院。1979年任教，历任讲师、学科组长、副教授、副主任、主任。主要著作有《师范群英光耀中华》第三卷、《军校学员道德规范》、《喉舌与利剑》等。军队育才奖获得者，空军高层次科技人才，校优秀教师标兵，荣立三等功两次。中国伦理学会会员，西北军队政治工作学会副秘书长，校学位委员会委员、高职评审委员会委员。现为空军工程大学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大校军衔。



自序

一

马克思说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。

时势造就人。一个人，既是父母的子女，又是时代的产儿。人生道路虽可选择，但人的生存时空则不由自主。我出生于“人育人”“人帮人”的激情岁月，磨砺于“人整人”“人防人”的动乱年代，成长于“改革开放”的新时期，成熟于“与时俱进”的新世纪，在部队这个“大熔炉”“大学校”中锻炼成长。

在我出生前的半个世纪里，近代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：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，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；五四运动的爆发，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；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打了28年的仗，牺牲了几千万人，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。在我出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，现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：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，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，抗美援朝取得了胜利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，人民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，雷锋精神传遍神州大

地；经过十年曲折发展之后，邓小平领导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中国人从此开始富起来了；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继往开来，领导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，收回了香港和澳门，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，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；在新世纪之初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，正在带领中国人民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。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，对我的人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。我自豪，我是炎黄子孙。我骄傲，我是中国人。我庆幸，我生活在这样好的时代。

1953年农历六月初四，我出生在陕西省朝邑县（1958年底划归大荔县）朝邑镇民主村一个农民家庭。我的家乡地处“八百里秦川”东部，素以土地肥沃、农产丰富而闻名。据《大荔县志》记载：大荔县位居关中平原东陲，南临渭水，北枕镰山，东濒黄河，境内黄河、洛河、渭河汇流。“大荔人”距今25万年左右。古为秦晋交通要道。从西魏至明清，为同州府所在地。历来是关中东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的中心。“沙苑文化”灿烂久远，“同州西瓜”闻名遐迩，花生、红枣、黄花菜产量居全省之首。真可谓“地理特殊，历史悠久，物华天宝，地灵人杰”。

我的祖上以鞋业为生。父亲王双保，建国前以盐业为生，建国后以农为业。他生性耿直，为人忠厚，虽识字不多，但精于各种农活，尤以种瓜、种菜而见长，曾多次担任生产队长、出纳、保管。母亲李玉侠，出身富裕家庭，有小学文化，性情温和，相夫教子，长于烹饪、纺织、裁衣、剪纸，乐于帮人，建国初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长期担任村妇联主任。

我家所在的民主村，以本地人为主，加上来自河南、山东等地的部分移民，共有百余户人家。从我记事起，村里就有一所小学，据大人说那是政府用过去的“老爷庙”改建的。1961年9月，父母送我进入这所学校读书。每当我望着那黑灰色的庙宇式教室，耳

边就会想到那些没上学的伙伴传说的“占老爷的庙上学会遭报应”之类的话，顿时不寒而栗。于是我经常逃学。幸亏有个姓焦的女老师，反复劝导说：“只要你好好学，不要动那些神像，就不会遭报应，神老爷还会保佑你呢。”这才使我重新鼓起了上学的勇气。还有个男老师姓孙，对学生很严厉，罚站、打板子、揪耳朵，我都领教过。但那时学的语文课如《井冈山》等至今难忘。每当我想起这些，就会对童年的启蒙老师生出几分崇敬和感激之情。

1966年9月，我进入当地的堤浒高小读书。学校距家十多里地，我第一次离开父母，开始了陌生的住校生活。住的是地铺，上面垫着麦草，夏热冬冷。吃的是从家里背来的地瓜、玉米面馍、炒面，一小瓶萝卜白菜做的小菜要吃上一周。但这里的校园环境、教室条件、老师水平都是本村小学望尘莫及的。最高兴参加文体活动，轻松又愉快。记得当时与程国栋同学说的对口快书《县委书记焦裕禄》，还得到学校的奖励。一次，外婆到学校来看我，从怀里掏出用粗布手绢包着的两个白面烧饼，真叫人喜出望外。她告诉我“你离家远，以后就到外婆家背吃的”。外婆信神，她不准我参加当时学校组织的所谓“破四旧立四新”活动，说“这不吉利，会遭报应的”。忘不了外婆给我讲的那些遥远而迷人的民间故事，忘不了那些有白馍好菜吃的日子。后来当兵在外，就连外婆去世，也未能奔丧，至今悔恨不已。

1968年9月，我考入朝邑中学读书。在这里，我读完了初中和高中。这是当地最有名的重点中学，座落在镇政府旁边，占地千余亩，高大宏伟的校门，排列整齐的校舍，宽阔平直的马路，设施齐备的体育场，还有一批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尖子老师。学生大多来自镇上职工、干部和当地驻军的子弟。我自知出身贫寒，将来只能“吃自己的饭，流自己的汗”，靠天靠地靠祖先，都是靠不住的。我也深知父辈们在过去因无力上学而缺少文化的苦楚。我更理解父

母在那样的年代供养三个儿女同时上学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我经常反复暗示自己：要争气，要对得住父母，要靠自己救自己，绝不能自暴自弃，绝不能落在别人后面，绝不能让父辈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！这种信念和力量一直在支撑着我。于是我不再自卑，不再悲伤，也不再顾及别人的冷眼指划，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学习文化、“学工”“学农”“学军”活动以及各种校园公益事业。我的付出很快得到了回报：班里同学从歧视到理解进而发展到解囊相助，不时发现课桌抽屉里有同学放的白馍，有个姓肖的女生竟然在全班发起募捐帮我买了一件军装绿上衣；校方决定从初二开始将我每学期6块钱的学费减免一半；1971年五四青年节前夕经东斌同学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；学校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还吸收我为宣传队员。我演过学生，演过老师，还演过地主。最值得自豪的是，我在“革命样板戏”中成功地扮演了李玉和这个角色，曾代表县文教系统参加了全县会演，成了当地闻名的“人物”。县文工团要我和扮演李铁梅的同学去县剧团当专业演员。后因父母坚决反对，只好作罢。在那些动乱的岁月里，母亲作为一名老党员和村干部，她严厉制止我参加所谓“批判走资派”的活动。于是我成了“逍遥派”，直至“复课闹革命”。

难忘的青少年时代，使我感悟到：是八百里秦川这块沃土繁衍了我这个炎黄子孙，是父母双亲用血汗把我养大成人，是恩师的教诲使我学到了立身做人的本领，是党的教导使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，并使我逐渐形成了对父母、对家乡、对老师、对党和政府的深厚情感，培养了独立自强、吃苦耐劳、热情奔放的个性，以及对文学艺术和体育活动的兴趣。

二

有位哲人说，“人生要紧的只有几步”。而我以为，有时甚至只是关键的一步，就会影响你一生的价值和追求。当年如果不是父母阻止，我后来可能成为一名秦腔演员。初中毕业那年，县邮电局来学校招工，目测、体检、政审一路过关，但后来却不知为何未被录用。在高中毕业回乡任教的那年冬天，部队接兵的首长来了，而且住进了我们村里。这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：12岁那年，因家里生活困难，与小伙伴同去黄河滩捡花生，幸遇亲人解放军，不仅给我们白米饭吃，临走时还给每人小篮子里装满了花生。上中学时，校园里曾驻扎着一支通信部队。军人那种严格、整洁、活泼、有序的生活，与中学生那种松散、脏乱、单调的生活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这使我时常生出一种羡慕之情，盼望着有一天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
人生不知要经历多少个“第一次”，而这一次却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。1972年12月，我自愿报名，应征入伍，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。当我身穿绿军装，胸戴大红花，在亲人和同学们的簇拥下，在一片锣鼓声、鞭炮声、欢呼声中，告别父老乡亲，登上西去列车的时候，激动的泪花模糊了我的视线。一路上，火车开开停停，一会儿在漆黑的山洞里摸索慢行，一会儿又在明媚的坦途上飞奔疾驶，一会儿在乌鞘岭上艰难攀登，一会儿又在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中稳步前进。望着窗外，我看到了从未见到过的景物：一队队驮着重物在沙丘上跋涉的驼队，一行行被狂风沙吹斜了的沙枣树，一栋栋用土坯砌成的又低又平的民房，还有那西北独特的农夫与“二牛抬杠”式的耕作方法。偶尔你会发现，有受惊的野兔在铁路旁跳跃而窜，有啼啼的山鸡尖叫而飞，还有一群黄羊向远山深

处惊慌而逃。这一切都是那么新奇，那么令人兴奋和神往！

坐在车厢里的新兵，个个兴高采烈，豪情满怀。可谁都不知道自己要去那里，何时才能到达终点。当我在某兵站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甘肃玉门时，不禁想起了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篇《凉州词》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顿时，昔日“黄沙直上”、戍卒守边的悲壮场景好像就在眼前，一种苍凉凄楚之感袭上心来。然而，当我们经过三天三夜的火车行军到达玉门时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天地：谁能想到，古代恩泽不及的荒蛮边陲，如今已变成一座新兴的石油城。高的大楼，宽宽的马路，一片一片的绿洲，还有热情欢迎子弟兵到来的玉门石油管理学院的师生们。这里曾经是“铁人”王进喜战斗过的地方，那一台台昼夜不息、上下运转的抽油机，是这座城市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。紧张的新训开始了。天气寒冷，高原缺氧，食宿不惯，真叫人难以忍受。令人感动的是，善良、淳朴的玉门人民，对子弟兵情深意浓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训练条件，而且军人坐车、洗澡、照相，竟然分文不收。真可谓：玉门关，今非昔比，春风“又度”；拥军城，名不虚传，终生难忘。

人的一生，总要扮演许多“角色”。不同“角色”的转换，是人生必须回答的课题。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，我初步完成了从学生到战士、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。随后，我被分配到坦克某师某团装甲连。进了深山，我便迷失了方向。直到半年后的一天，我有幸同老兵一起坐卡车到山外去拉菜，这才弄清了自己所在的位置。听司机说是去嘉峪关市，这使我想起了那句“过了嘉峪关，眼泪擦不干”的古语。然而，当我站在雄关下仰首翘望，青砖砌成的城楼雄伟壮观，“天下雄关”四个大字苍劲有力，胸中瞬时升腾起一种守卫边关的神圣责任感。在关楼前的石碑上镌刻着它的历史：万里长城，东起山海关，西至嘉峪关。它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

西部，嘉峪关山南麓。明洪武五年（1372）置关于此。它依山而建，居高凭险，自古为东西交通要冲。兰新铁路经此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我登上城楼远眺东方，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尽收眼底。据老兵说，嘉峪关市有钢铁、机械、电器、水泥、化学等工业，市民主要以当年支援大西北时从上海等地来的“知识青年”为主，他们扎根荒漠几十年，至今还保持着这个群体特有的生活方式。

人生总是有苦有乐、苦乐相伴，有得有失、得失相随，有生有死、生死相依。我们连队驻扎在距嘉峪关 50 公里的一个叫“红柳沟”的地方。这里四面环山，非常隐蔽，仅有一条河沟里的沙石路与外界连接，方圆百里没有人烟，几乎与世隔绝。我断言，只要你身临其境，就不难理解什么叫“奉献”。这里长年干旱少雨，四季风沙肆虐，气候干燥寒冷，仅有沙枣树、红柳树、骆驼刺等植物仍在顽强地生长着。战士们戏称当地有“四大怪”：“风吹沙子跑，地上不长草，房上能赛跑，大姑娘不洗澡。”就是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里，官兵们同住在“泥打垒”“地窖子”，这种“羊圈式”“地鼠式”的营房，却有着防风、防沙、保暖、保密等优点。吃的是大米白面，战士们还自己种菜、养猪，冬季的家常菜是土豆烧牛羊肉。文化活动就是唱歌、打球、做游戏。那时的新兵每月津贴仅 5 块钱，可我一年竟攒下了 50 块钱，一半寄给家里，一半交到连部作为救灾捐款。我很快摸到了部队“三三制”的生活规律：洗漱“三把脸”，吃饭“三大碗”，走路“三挺三收”，操练“三把枪”，登车“三步上”。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，我学到了很多本领：我学会了刺杀、爆破、投弹、射击、土工作业步兵五大技术，其中刺杀和射击曾在连队练兵比赛中获得奖励。我学会了驾驶坦克和装甲输送车，每当我驾驭战车在一马平川的戈壁滩上飞奔时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我学会了 220 电台的操作与使用，每当我以

“小教官”身份坐在指挥车里用电台指挥着 12 辆战车不断变换出各种战斗队形的时候，仿佛自己就是一位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。我学会了指挥部队拉歌、组织篮球比赛，在娱乐之中增进了战友情谊。我还学会了喂猪、做饭、洗衣服、种菜等技艺，增强了独立生活的能力。第二年春天，部队移防酒泉。提起这个地名，就会使人想起唐代诗人王翰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的佳句，以及古代“将士同苦乐”的动人故事。据说，古代有位将军领兵打仗，凯旋而归，但庆功时只找到一坛好酒，于是令士卒将酒倒于湖中，众将士以水代酒，庆贺胜利。“酒泉”由此而得名。它南靠常年积雪以雪莲闻名的祁连山，清澈、甘甜的雪山之水滋润着这块绿洲，盛产小麦、玉米、谷子。就在它的身旁，我生活战斗了整整五个春秋，度过了我前半生最美好、最难忘的时光。连队“大家庭”的温暖，使我懂得了团结、协作、互助的道理。在这里，我经受住了苦乐、得失、生死的考验。一次，我开窗驾驶着装甲运输车从悬崖峭壁下通过，突然一块巨大的飞石从天而降，砸在距脑袋仅有半尺远的车门上，有惊无险。又一次，部队正在河滩训练，突然山洪暴发，一辆坦克在水中熄火被淹。团长闻讯赶来，指挥打捞。洪水中捞坦克，犹如“水中捞月”。他命令我排全体下水打捞。因我是“旱鸭子”，结果被洪水冲卷而下几十米，幸亏那棵已经干枯了的红柳树。再一次，一名战士不慎掉入水渠被冲进了冰湖。团部命令我们装甲排，立即用密封好的两辆六三式装甲运输车，破冰潜入湖底寻救战友。我又一次经受了死神的考验。还有一次，在助民劳动中帮助老乡扬麦子，当快要完工我去清除电机下的麦子时，被漏电的电机重重一击，双手被牢牢地粘在了电机上。事后我才知道，是一位急中生智的老爹救了我的命。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。1974 年在党的生日那天，经薛忠义排长介绍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75 年在共和国诞辰之际，我高兴地拿到了

进入军队干部行列的“入场券”：去师教导队学习。1976年春节刚过，我接到了担任装甲排排长的命令，开始负责本排及全团各营装甲车乘员的全训任务，这使我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提高。

火热的军营生活，使我体会到：失去的，只是一时的花前月下，天伦之乐，乃至发财之机。得到的，才是受用终生的吃苦耐劳、勇敢坚毅、严谨认真、乐观进取的意志品质。芸芸众生，谁不道军人“苦”。而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，因为苦惯了，所以不知什么是苦。古往今来，谁不言军人“险”。而对一名革命军人来说，因为深知磨难的价值，所以无所畏惧。当今社会，谁不说军人“亏”。而对一位党员干部来说，因为得到的太多，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亏。

三

求知的欲望是推动人们从事学习活动的内在力量。人的一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习动机和目的。我上小学时，只想玩，不愿上学。因此经常受到长辈和乡亲的呵斥：“不好好学习，一辈子打牛后半截去”。那时是为家长而学，为光宗耀祖而学。学的好，就是好孩子，就会受到赞扬和奖励。学的不好，就是坏孩子，就会挨骂甚至挨打。我上高小时，方知中华祖先有那么多诸如“头悬梁”“锥刺股”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等动人的勤学故事，但对“为何而学”仍似懂非懂。那时似乎是为老师而学，大人们常说：“宁肯对不起父母，也不能对不起老师。”我上中学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记得有一位语文老师因在课堂上散布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“学而优则仕”等言论而遭到强烈批斗。当时更多的师生主张要像青年周恩来那样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，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读书。我真正认识到学习的真谛，还是在走进军校之

后，并随着离职学习、在职进修和个人自学经历的日益丰富而不断加深。

目标，是人生前进的动力。我热爱大西北，我留恋火热的连队生活，但我更向往内地，向往军校，向往北京，向往人生的飞腾。1978年春天，经组织选拔推荐和入学考试，我进入装甲兵学院政治指挥专业学习。学院所在地石家庄，有华北制药厂、马胜利造纸厂等大型企业，有西柏坡、华北烈士陵园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革命圣地，通过参观见学，使我增长了知识，陶冶了情操。特别是，这里距首都北京仅200多公里，这使我有幸多次走进北京，几乎访遍了京城各大名胜古迹，不仅开阔了视野，而且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深刻影响。经过院校三年多的学习训练，我第一次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、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和连营团三级指挥战术，圆满完成了学业，院长张重远亲自为我们颁发了本科学历。随后，我留校任教。1983年秋，我成为河北大学军队在职定向委培生，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，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学习，打下了人文知识基础，顺利完成了学业，校长于善瑞为我们颁发了本科学历。1987年9月，我开始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。经过三年刻苦学习，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，院长朱京为我们颁发了本科毕业证书。在长达25年的求知生涯中，我还先后参加了总参两期哲学经济学专业政治教员轮训班、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写作和中国通史专业、西安政治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、全国自学考试党史专业、装甲兵学院教育学专业、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“广播电视英语课程”大专班、南京政治学院邓小平理论研讨班和全军政教室主任进修班等学习，均取得了相应的毕业、结业证书。我体会到：不断地学习、进修、“充电”，实际上已经成为我的工作，我的生活，乃至我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高尔基说，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。而对一个文人来说，书

是他的命，书是他的根，书是他的生存之基、动力之源。我一直认为，教师与书同样有着不解之缘，买书，藏书，读书，教书，写书，以至于卖书，实乃天经地义、无可非议。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对书的癖好甚至到了“疯狂”的程度。每月62元5角的工资，除了交饭钱其余全部用于买书。令人至今痛心疾首的是，我经过12年省吃俭用购买和珍藏下的心爱的书，却在那次从石家庄向西安搬家时的铁路运输途中大部分丢失了。有一次，我和儿子去西安民生对面的新华书店买书，偶然发现我认识的一个著名作家，他穿着一身旧西服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站在书架前看书。几小时后，等我们下楼要离开时，他竟然还在那里看书，我突然感悟到：买书不如借书，借书不如到书店看书，看书不如听书，听书不如教书，教书不如写书，写书不如卖书。“读书是学习，使用也是学习，而且是最重要的学习。”如同清朝刘岩所说：“读书虽可喜，何如躬践履。”“读死书”“死读书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方能大器晚成。

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一名教师，是多么渴望有一天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如今使我感到欣慰的是，虽已年近半百，但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，自题名“白鹿斋”。可以预言，在21世纪，学习必将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，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终身学习的新挑战。

四

在中国社会，“官本位”观念根深蒂固。尽管历代明君贤臣一再劝告世人，“无官一身轻”，“伴君如伴虎”，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，“官贵民贱”，“是官比民强”。于是，很多人苦求仕途，跻身官场，以至于跑官，要官，买官，卖官。而自古草民之